

陈忠实 主编

陕 西 旅 游 历 史 文 化 丛 书

三秦史话

关中书院与关中学派

岳少峰

秦出版社

B244.4

3

心实 主编

旅游历史文化丛书

三秦史话

关中书院与关中学派

岳少峰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秦史话—关中书院与关中学派 / 岳少峰著 .—西安：
三秦出版社，2004.12
(陕西旅游历史文化丛书/陈忠实主编)

ISBN 7 - 80628 - 905 - 4

I. 三... II. 岳... III. 陕西省—地方史—通俗读物
IV. K294.1 - 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23429 号

三秦史话

关中书院与关中学派

岳少峰 著

出版发行	三秦出版社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	西安市北大街 131 号
电话	(029)87205106
邮政编码	710003
印刷	西安东江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6.625
插图	27
字数	120 千字
版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5000
标准书号	ISBN 7 - 80628 - 905 - 4 / K · 403
定 价	10.00 元

陕西旅游历史文化丛书

主 编：陈忠实

副主编：韩养民

郭兴文

总策划：魏全瑞

刘 利

白绍俊

李毓秦

孙守平

序

历史文化与旅游的关系，近些年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呈献在读者面前的这部规模宏大的《陕西旅游历史文化丛书》，就是这一趋势的具体表现。

旅游是人们生活的重要需求。在旅游时，大家不仅寻访崇山秀水的自然风光，更希望感受远传厚积的人文氛围。以历史文化丰富旅游，也通过旅游理解历史文化，在我们这里久已形成传统。家乡在今陕西韩城的司马迁，年方二十便“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正因为这样，他具有了辽阔的视野，广大的胸襟，终能写成不朽的《史记》。后人常以行万里路与读万卷书并称，是有道理的。

说到中国的历史文化，不能不把眼光集注于陕西。不久前卫视一个专题节目中，有学者形象地比喻说陕西是“中国的芯片”。我觉得，如果从传统历史文化的角度来看，陕西毋宁说是内存极其丰富的“硬盘”，从这里能够获取的信息太

多了。陕西，特别是其核心关中地区，属于广义的中原文化圈，可说是中国文明的破晓之地。记得二十年前，我有幸为陕西省考古学会所编《陕西考古重大发现(1949~1984)》撰序，提到“陕西是我国古代文明发源地之一，历史上几个最重要的朝代，如西周、秦、前汉和唐，又都建都于此，因而古迹文物异常丰富，踏入省境，大小城邑，一山一水，无不和我国的悠久历史有密切关系”，今天我想再重复一次这段话，并作几点引申。

陕西位于中华大地的腹心，在绵延久远的中国历史上起着关键的作用。假设只就定居的农业文明看，周、秦、汉、唐定都陕西，似乎是偏处西隅，但中国自古以来是多地区、多民族的，有着多种多样的灿烂文化，在北方、西北、西南还居住着许多习惯风俗有别于中原的民族，而陕西正扼处不同文化交错沟通的枢纽。十三个王朝的都城都选在陕西，自非出于偶然。

在古代中外交通的历史上，陕西尤其据有特殊的地位。两千多年前的秦朝，宽阔的直道、驰道已以这里为中心，形成贯通四方的网络。汉唐时连接欧亚的“丝绸之路”，更以长安为起点，外来商贾络绎不绝。唐代日本空海至此学习中国文化，创造出日文片假名；鉴真也由此出发，七次东渡，终于将中国文明带往日本。日本诗人有著名俳句：“在盛唐时期，信步于夜间的长安市”，以

深远的情思追忆了当时的景象。

正因为陕西有无比深厚的历史积淀，自汉朝起便不断有文物发现，张敞考释尸臣鼎即是其间最早的佳话。近代以来，重大考古发现接踵而至，令人目不暇接。蓝田人化石，半坡与姜寨的仰韶文化遗址，精美璀璨的西周青铜器、玉器，雄壮奇绝的秦始皇陵兵马俑坑，法门寺塔基佛指舍利和精致绝伦的金银器，绚丽多姿的唐三彩，雄浑壮美的陵墓石雕，……说不尽的文物珍宝，艺术精品，足以使任何参观者眼花缭乱，叹为观止。谈起旅游与历史文化的结合，陕西最适合作为典型范例。

陕西历史考古方面的论作硕果累累，但多属于专门著述，从一般读者，特别是从旅游者角度着眼的作品不多，十分需要一套全面系统介绍陕西历史文化的读物。令人高兴的是，李毓秦先生于完成国家“九五”重点音像出版规划项目《黄土文化寻根》大型系列片后，即策划组织这套百卷本的《陕西旅游历史文化丛书》，弥补了这一缺憾。

这套丛书由著名作家，《白鹿原》作者陈忠实先生任主编。担任副主编的是在西北大学历史系多年执教的韩养民教授，曾成功地主持《中国风俗丛书》；另一位副主编郭兴文先生则是报社资深编辑，有丰富的著作和编辑经验。在这样好的主编班子推动下，这套丛书的作者都是有专业素养

的学者，保证了书的质量。值得称道的是，丛书虽由专家学者编写，但为了面对大众，采取了探索与普及相结合的方式，力求避免学究气的艰涩笔调，加入故事性、趣味性，使文字更为可读。

陕西是文物考古大省，历史文化中心，是国内外注目的旅游热点地区。相信《陕西旅游历史文化丛书》的问世，对广大读者和旅游事业都有很大的裨益。

李学勤

2003年6月29日

认识我们脚下的土地

自序

历史哲学告诉我们：鉴往方能知来。昨天是今天的序曲，明天是昨天、今天的“三重奏”。可是，在人类社会踏进知识经济时代的门槛时，知识信息的爆炸，使得以往不曾有任何一个时代象今日这样，有数千倍新、奇、特的怪异之物诱惑、吸引着人们的兴趣和注意，充塞着人们的心灵空间。高频率的影像交替更迭，以至于人们的大脑没有了收藏记忆的间隙，古希腊神庙坍塌式的群体失忆成了今天社会的流行病。一切都瞬息万变，稍纵即逝，记忆本身就在遗忘、涂改和否弃为代价。然而，在否弃与忘却的过程中，人们连故事与故事之间穿行的灵魂也漠然、淡忘了，甚至呈现出溟朦和迷茫，不知我之为我，从何而来，又将何往？！于是乎，重构群体记忆的大厦，继往开来，便成为现今一个关乎民族活力、国家命运的迫切命题。对此有着远见卓识的堂堂北京大学著名教授钱理群先生，前不久向人们发出了震聋发聩的呼吁：“想大问题，做小事情”，“认识我们脚下的土地”！（《新华每日电讯》2004年1月1日第

自序

二版《钱理群呼吁“认识我们脚下的土地”》)并且身体力行,不惜以一年的时间,洋洋51万言,编写出版了乡土文化教材《贵州读本》,且奔走多所大专院校,举办“乡土文化教育”的讲座,解读曾给他以滋养的贵州文化特点。微言大义,阐释乡土文化背后的底蕴、神韵以及深层次的文化即终极关怀问题。他中肯地指出:“当代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一代,有一种脱离自己土地的倾向,对自己生长的土地上的文化、人民,在认识、情感乃至心理上,出现陌生感和疏离感,这有可能导致民族文化的危机。当年轻人缺乏和母体文化的血肉联系时,甚至可能会出现‘无根’的一代”。(同上)的确,全球化不等于听任强势文化君临天下。全球化前提下更应允许各民族文化存在的多元化格局,这样世界才会更精彩。年轻一代是担负我们民族文化续存重任的承载者。重构民族文化记忆,要从乡土(地域)文化教材和教育着手,刻不容缓!

《陕西旅游历史文化丛书》的策划、编辑者们,独具慧眼,与钱理群先生不谋而合,殊途同归。他们在努力解读陕西历史、文化、人物、风俗人情,构建陕西旅游文化体系时,正是干着重建历史记忆,帮助人们认识自己脚下的土地,着力解决大家对母体文化的陌生感和疏离感以及民族文化续存的急迫问题。堪说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我不揣浅陋,也以拙著《关中书院与关中学派》一书,参与了重建陕西

本土文化的“大合唱”。滥竽充数，诚惶诚恐。学养不足以当此大任，行文走笔不免稚拙和愚妄。怯森森，捧出弊幕，旨在见教于方家。窃以为，反正豁出去了，不归于“伟大”，那么就“渺小”一回！

如今，我们业已进入了一个商品化的消费时代。物化的速成在极大地满足了人们便捷的生活需求的同时，意识形态领域内随之而时兴的是精神文化的“快餐”消费。昔日自然经济条件下，那种“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王维）式的恬静、肃穆、潜识默想和物我两忘的哲思境界已不复存在。光怪陆离、飘忽不定的客观实在，将人们的记忆像随风凋零的树叶一样，迅速撕碎、消解。记忆与遗忘、学习与否弃之间，没有了历史的纵深感。企业的卒生与倒闭，股市的潮起潮落，……作为自然人的命运，有如挂落在荒漠草茎上的纸片，变得捉摸不定，倾刻浮于云端，俄尔又化归乌有。所以人们浮躁不安，焦虑不宁，对过去的健忘胜过对生活的回味，对未来的祈福远胜过对往昔的追忆。群体失忆甚至失语，成了不用默许的共同的麻木不仁。当人们来去匆匆，为了生活、生存奔波之际，对脚下这块赋予我们生命，给了我们精神滋养的土地，不再是“相看两不厌”。那种诗意的隽永、欣赏、体味淡去了。在这块热土上，那些曾经演绎过大手笔历史篇章的旷世人物，那一则则惊心动魄的历史故事，那一个个沁入我们血脉，至今仍在左右或影响我们行为方式、心

理习惯的历史幽灵，被时间的手抹平了，被岁月的季风风化了。在人们尤其是在年轻一代的脑海里，呈现出历史断裂式的空旷和空白。不知什么时候，我们与脚下的土地疏离了，以至于失魂落魄，犹如一株无根草，随风飘落，没有了厚重，没有了底气，丧失了活力，逃逸了自我和尊严。群体主观无意识的失忆、失语，使得村落与城市，乡下人与城里人，统统表现出思想精神上的水土不服，整体消化不良。不是吗？往昔那一张张个性鲜明，民族特征突出而又多样化的脸，被涂抹得千篇一律，呆若木鸡，失去了灵性。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西方强势文化的风暴，业已把我们民族风格凸显、神情十足、浸透着诗意、保持着永恒的审美意趣，凝固为别致的一个个物化的城市，雕凿、搅拌成一盘神情模糊、惨不忍睹的沙拉，不再是昔日令人留连忘返、乐而忘忧的“人生的盛宴”！我们若能忙中偷闲、稍事驻足沉思，便会羞愧难当，不敢再直面祖先的灵堂。那是因为我们在求新求快的历史阵痛中，将婴孩和污血一同泼掉了。随之而来，按捺不住的是“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的游子情怀，是盛世浮华下无所归依的精神悲哀——倘若我们的良知还像希伯来先知耶米利写就《哀歌》，在骷髅地山丘下的石洞独自哭泣时那样，依旧对个人的记忆保持诚实的话！
基于上述的情思和意绪，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关学之乡的后生晚辈，历经“十年文革”的洪荒年

代，欣逢改革开放，注重文化建设的盛世。纵使孤陋寡闻，政务缠身的我，也义无返顾、毅然决然地硬着头皮上阵，参与其间。然行文走笔虽不涉方家理路，却遵循一己之俗见，按照“溯源篇”、“人物篇”、“理学篇”的谋篇布局，将关中书院、关中学派的来龙去脉，出处归宗，作了粗线条、巡礼式的梳理。愚以为张载是关学的鼻祖，张载的学术思想是影响和主导后世历代关学发展的主线。虽然江山代有人才出，张载身后学派纷生，各有秉赋，其理路、风格尽管打着不同时代的凝重烙印，可万变不离其宗。此其一。其二，关中书院是明、清时期关学续存发展的辐辏，透过关中书院这扇历史的门窗及其历史人物画廊，其间代表人物的智慧之光为伞状辐射，泽被三秦大地乃至整个大西北，衍化影响十分久远。其三，本人才疏学浅，加之历史资料匮乏，凡所述人物，颇难做到与古人相视而笑，莫逆于心。为了不影响公务，我不得不强迫自己把时间的“边角料”精心掇拾起来。于是，在蚊虫叮咬的夏夜，在鞭炮齐鸣的节假日，在万家灯火的温馨之时，自闭斗室，在书海中漫游，在青灯黄卷之中求索，悉心寻觅脚下这块热土中思想文化巨子们不灭的幽灵，体味他们于当时当代历史文化困境中的喜、怒、哀、乐、爱、恶、欲，企图求证今人的思想、文化、习俗、德行、性情的出处渊源。可情虽难却，终力有不逮。张载、冯从吾、关中三李、刘光蕡……，每当我满怀钦敬之情，触摸每一位

乡贤先哲时，他们的学问人格、铁骨血性、儒雅风流，都使我宛如翻越一座座大山巨川，高不见顶、深不着底，陡生卑琐之感。其间历史的隐秘，曲折的故事，主人翁那不屈不挠、特立独行的人格和胆识，以及国家恨、民族情、道义心与社会责任感，千折百回、千丝万缕地交织在一起，构成一幅幅荡气回肠、感人肺腑的历史画卷。这画卷时而黑云压城，令人胸闷气短；时而酣畅淋漓，有如醍醐灌顶。历史更像一面镜子，它毫不留情地映衬出时下人们的俗气、浮泛、卑微、渺小甚至丑陋！管中窥豹，也约略能探寻出今天陕西人伦理观念、行为方式、价值追求、性格特征，其来有自的蛛丝马迹。

凭心而论，没有整段时间写作。不时处在“为政”与“学问”的双重角色艰难地转换之中，断断续续，勉力耕作，所以难以做到一气贯注。文气中断、纰漏和知识性错误在所难免。但宁伤自己，毋伤友情。当拙著杀青付梓之际，一向惰性十足的我，由衷地感谢《陕西旅游历史文化丛书》的策划者之一，我的老朋友、儒商典范、仁厚兄长李毓秦先生以及《西安日报》社名记者郭兴文先生。没有他们的串掇、鼓励、支持并督促，这本小册子拟或胎死腹中。特别是李毓秦先生，其意勤勤恳恳，不止一次地激将我：“你是学文的，生于关学之乡，又是张载的乡党，且与‘关中三李’之一的李柏村连着村，现又工作在碑林区，衙门（书院门碑林区政府旧址）正对着关中书

院，撰写关中书院非你莫属！”我迟迟未敢动笔：一是对自己的业力缺乏自信，怕出乖露丑，误人子弟；二是时下，滥出书已成社会公害，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恐遭不务正业，附庸风雅之讥。可李先生紧催不舍，东奔西颠，苦心为我搜集、复印相关史料，又不时将参考书送至我的案头。他的一片笃情盛意，深深地感动了我。于是，犯难鸭子上架，狗尾续貂。心想作为政府公务员即便是为了碑林区“旅游兴区”的事业，也应奋力一搏。现在，这本小册子终于羞羞答答问世了，算是给毓秦老兄一个交代。同时，我还要感谢碑林区委办公室的秦鹏同志，没有他牺牲休息日，加班加点替我打印、校对书稿。我一个“功能性文盲”，面对出版社须提供软盘和样稿的要求，将一筹莫展。我更要感谢三秦出版社编审冯慧福老先生，是他在审阅书稿中，查缺补遗，帮助我纠正了不少知识性错误。在此，对为本书精心设计装帧，并设法配置插图的李毓秦等众多同志一并致谢！没有他们的努力，本书难以达到图文并茂的理想效果。

美学家李泽厚先生指出：在当今社会，“‘人活着’正处在双重异化中，异化的感性使人成为纵欲的动物；异化的理性使人成为机器的奴仆，‘人是什么’变得很不清楚了”。（李泽厚《虚无以责有》，《读书》2003年第七期第54页）这的确是人类的悲哀。今天，我们呼吁“认识我们脚下的土地”，强调文化（包括本土文化或地域文化）重建，重构群体记

忆，并非要开历史倒车，而是旨在自觉深入地推究我们所在的文化本原，亦即“溯源于本始，致用于当世”，以期唤醒人们的“文化原我”意识，从而以一种开放性与自主性并重的文化理性姿态去面对异彩纷呈的社会现实。不要说追求关学先贤们所倡导的“大儒”、“真儒”的境界，最起码也要具备“雅儒”的节操，而不至于去做以曲学阿世为能事，武大郎开店式的排斥俊杰、扼杀英才的“俗儒”，守住为人处事的基本道德底线！毋庸置疑，我们所关心的焦点问题在人，即人的生存、生活状态，人的文化语境，人的终极关怀，包括人的形而下（物质追求）和形而上（精神追求）追求在内的全部生活真实。那么，关中学派作为一个特定的文化生成体，自有其发育、发达、直至变异、衰落的历史运行轨迹，也有它特定的复杂的历史文化语境，并在其既成的知识体系框架中运行。随着改朝换代，历史变迁，以及关中学派自身生命力和周围文化语境的变化，在主流意识形态对其认同或排斥、压制或放任的作用下，便形成了自己颇有历史意味的运行曲线。在对这一曲线的梳理分析中，通过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过滤，我们会从中获得不少有益的借鉴、启示和感悟，进而去自觉地调适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找准自己人生的坐标，守住人的内心的神性和尊严，并超越自我，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大写的“人”。（孙文魁著《关中学术史话》序）

诚然，关中学派经过上千年的历史演化，其历史文化语境复杂，学术思想博大精深，代表人物数以百计。我作为一个旁门左道，才疏学浅，从事梳理其发展变化的工作，本来就是一件出力不讨好甚至自取其辱的事。瞎子摸大象，只能触及皮毛，万难洞烛幽微，谬误在所难免。因而，我于此低首下心地恳请方家不吝赐教，助我匡误纠谬，以免遗害他人，有辱斯文。我将不胜感激！是为序。

关中书院与关中学派

自序

岳少峰

2004年5月5日

于西安振兴路龙吟斋